

主持人语: 量化历史是当前经济史与其它历史研究的热点。电脑能力的大幅提升、历史档案的数据库化与互联网化等,触发了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革命。基于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学者量化历史研究必然能够增加我们自己乃至全人类对我们过去的认知。本期特刊发三篇论文,以期更多学者参与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加入经济史研究的新时代。

主持人: 香港大学 陈志武教授

量化历史: 经济史学的新范式

熊金武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2249)

摘 要 量化历史主要以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范式革命在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体现。量化历史范式有利于推动经济史学融入主流经济学,使之成为经济理论创新的“源”。在学科范式上,量化历史研究围绕长历史和跨学科学术问题,基于扎实的史料和构建历史数据库,采用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断点回归等统计和计量方法,检验既有理论并突破常识收获新知。这符合“史无定法”和“破四就”“立四新”的经济史方法论创新原则,构成了经济史学研究的范式创新,是对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

关 键 词 量化历史; 范式创新; 经济史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9.03.006

量化历史是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界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领域。一般地,量化历史(Quantitative History)又被称为计量史学、历史计量学或计量经济史学,它主要是以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历史维度的研究,具有交叉科学的特征。量化历史研究多体现在经济史学领域,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的一个主要分支^①,是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方式之一,即

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开展研究^②。从科学哲学角度,“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③。按照这个定义,可以认为经济史学已经出现了一场量化历史的范式变革。早在1983年,国际学术界就成立了专业学会,1993年计量经济史学创始人福格尔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量的量化

作者简介: 熊金武,男,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金融不良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16CXTD07); 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DSJCXZ180420)。

①孙涛、张蕴萍《历史计量学: 经济史学研究的进展》,《文史哲》2005年第5期。

②孙圣民《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③[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历史文章也出现在经济史期刊中。2013 年以来,我国连续举办了六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和国际学术年会,助推了国内量化历史的学术新潮。当前,从事量化历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群体,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并构建了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国际量化历史范式变革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史学界正处在这场范式革命中。

一 量化历史兴起及其学术价值

(一) 量化历史的发展历程

“兰克革命”以降,历史走向“科学的史学”,追求“科学化”的史学选择与社会科学合流,经济史是走在前面的。1892 年哈佛给予 William J. Ashley 第一个美国经济史教职,而此时经济学和各个维度的历史学成为经济史的主要范式。经济史从人文学科到社会学科的跨越主要体现在 20 世纪中叶的新经济史革命。一批经济史学家将经济学理论与统计方法应用于美国奴隶制、交通史等研究。1957 年 Alfred Conrad 和 John Meyer 在美国经济史协会上提交的量化历史论文和 1958 年发表的《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①被称作为量化历史研究的起点^②。自此,量化历史开始引导一场“知识革命”,逐步颠覆了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范式,并获得经济学界的普遍支持,发展为经济史的主要研究范式^③。同时,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已经很普遍。量化历史革命导致美国经济史学界更像经济学而非历史学,经济史学家若要取得学界认同,须努力满足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专业规范,更偏好在经济学

期刊而非经济史期刊上发表论文^④。

国际上量化历史发展的原因包括学科交叉化、研究对象平民化、计算机技术发展三个方面。第一,历史学研究试图通过引入规范和准确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以便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于是,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史学家借鉴政治学理论,社会史学家借鉴社会学理论。当然最突出的是经济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将经济理论和计量工具用于长期历史问题研究,并得到了打破常识的结论。第二,历史学者研究的焦点从历史人物转向了平民百姓。政治史从长期关注总统、将军等个人转向关心选民。类似地,经济史转向对工人收入、物价等问题的研究。第三,计算机技术和史料学的进步。计算机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的能力,而且使得基于数据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同时,计算机技术也提高了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许多数据不必要去查档案,采用电子档案就可以。甚至有一些历史文本分析,完全可以依托电子化的文本予以分析。此外,量化历史所借鉴的计量分析理论工具不断成熟,形成了一套分析框架。

20 世纪 90 年代末,量化历史再次以新经济史的面貌复兴。在 2004 - 2014 年期间,量化历史在经济学顶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和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发文数量分别约占 6.6% 和 10.8%^⑤。大数据理论和技术推动了量化历史的复兴。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概念为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数据总量的不断增加也为研究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新型计量技术不断被采

①Conrad, A. H. and Meyer, J. 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6, no. 2, 1958, pp. 95 - 130.

②North, Douglass C. “Cliometrics—40 Years Lat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 1997, pp. 412 - 414.

③Naomi R. Lamoreaux, “Beyond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ed. Francesco Boldizzoni and Pat Hudson,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35 - 54.

④Margo, Robert A,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into economics”, *Cliometrica*, 2018.

⑤Abramitzky, Ran. “Economics and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i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5, no. 4, 2015, pp. 1240 - 1251.

用,量化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传统量化历史侧重对重大历史现象与问题的讨论,多采用历史描述性推论,或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趋势性描述和相关性分析。新量化历史运用系统化的统计学方法,关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面板数据,借助历史事件拓展经济学、政治学或者社会学原理^①。这都使得量化历史研究不再是历史学内的历史计量学,更超越了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②。这一方面的代表成果是2001年Acemoglu等的论文,该文通过将殖民者死亡率作为殖民制度的工具变量,证明了历史上经济制度与现在的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③。

事实上,中国传统史学就比较注重数目字。梁启超早在《历史研究法》中就指出了统计方法的作用,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就可以认为属于量化历史研究成果。吴承明、梁方仲等经济史学者非常重视统计和计量分析工具,甚至提出“经济现象多半可以计量,并表现为连续的量。在经济史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④。近年中国学者在国际量化历史研究中也崭露头角,不仅通过量化历史讲习班与国际学界交流紧密,而且大量中国学者采用中国历史数据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不断涌现。

(二) 量化历史与经济理论创新

量化历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融合。为何量化历史能够兴起且对经济学如此重要呢?因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分析应该是历史、统计与理论的结合。理论和统计需要历史,而历史也需要理论和统计。一方面,经济学需要

历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⑤,而经济史学是研究历史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历史不是孤立的过去,而是具有历史惯性,包含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第一,历史是不容遗忘的经济学分析方法^⑥。从实证主义来看,历史事件如饥荒、瘟疫、大萧条等可以作为自然实验,检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⑦,而一些经济理论也必须使用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观察性数据才能得到证实。第二,历史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经济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⑧。实践出真知,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话语体系离不开“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⑨。中国的经济实践不仅包括我们今天的实践,更包括历史的实践。鉴于中国数千年连续的历史,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但是,目前经济学界却忽视了经济史学的研究。

另一方面,历史需要理论和计量方法。历史学要“受到研究问题所驱动、指引,带着问题、猜想假设去整理并利用史料”,“史料海洋提供了人类经历的数据资料”,“是证明证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理论结论的基础数据。关于历史的任何一项假设都可以、也都应该放到历史中去检验”^⑩。那么,经济史要对现代社会科学作出贡献,就需要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于是,经济史研究在分析方法上不得不面临量化分析的选择。在分析框架上,要

①李楠《新历史计量与历史自然实验》,《量化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②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③D. Acemoglu, S. Johnson & J.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1, 2001, pp. 1369 – 1401.

④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⑤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⑥[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陈平《历史作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自然实验》,《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

⑧[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史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⑨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⑩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经济观察报》2013年9月16日。

求遵循“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①这一研究路径。“量化史学不只是‘用数据说话’，而是通过统计分析，既可令人信服地证明或证伪现有假说，也可以从历史现象中发现全新的认知”。科学研究基本流程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提出问题和假说；第二，根据提出的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第三，做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第四，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文章。传统历史研究在第二至第四步上做得不够完整”^②。量化研究需求的冲击以及制度环境让国际经济史学者无法避免采用量化方法，而中国经济史学界也正在经历这种冲击。

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关乎中国经济史学的学科定位^③。经济史学科使命是参与经济学理论构建，为经济学提供基础^④。经济史研究何以能够成为经济学创新的源呢？用历史数据研究经济问题，进而提出新的理论，才可能是“源”；简单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历史问题，就很可能是流。量化历史突出特征就是应用经济理论、计量技术和其他规范或数理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只有真正达到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互动融合，才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的互动发展。鉴于经济学已经量化，那么经济史要成为经济学的源也需要增加量化分析。量化历史表面上是采用统计和量化的方法用于历史研究，或者采用历史数据的进行研究，但这绝不是一种技术的应用，更非简单的运用统计或数理模型工具分析历史数据，以便历史学者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量化历史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范式革命

在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体现。量化分析方法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普及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所谓量化历史就是指通过用量化方法来研究历史维度中的社会经济问题。量化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加回归分析，或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经济学研究，还需要研究和记录经济学理论未涉及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的经济史研究，才能加快推动经济理论进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

二 量化历史的研究框架

为了更好地理解量化历史的研究框架，在此从研究问题、数据资料、量化技术方法和结论四个方面对量化历史研究特点予以介绍。

（一）跨学科和大历史的历史问题

量化历史在研究问题的约定上，既包括了历史学问题，也包括了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相比于传统经济史学研究，量化历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大历史研究视野。Gregory Clark 教授根据历史人均 GDP 数据提出人类历史只发生了一件事——1800 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⑤。量化历史研究给大分流和小分流等传统经济史课题提供了新视角。世界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Jan Luiten Van Zanden 教授以“城市化率”和“城市规模”两个指标代表“经济增长”，“政权持续时间”和“议会活动指数”两个议会变量代表“制度发展”，发现制度差异能够帮助解释 1100—1800 年间西北欧与中南欧经济上的小分流^⑥。李伯重教授估计了 1820 年左右华亭—娄县地区（简称华娄地区）的 GDP 总量和结构，进而与同时代荷兰的 GDP 进行比较，发现“19 世

①刘巍《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②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③董志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④王玉茹《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构建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 年第 5 期。

⑤Clark, Gregory,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 Press, 2007.

⑥Van Zanden, J. L., Eltjo Buringh, and Marriten Bosk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uropean Parliaments, 1188—178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5, no. 3, 2012, pp. 835—861.

纪初江南经济已经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而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的近代经济”,不过中国人均 GDP 和 GNP 已经低于荷兰^①。只有从长时期历史变化的角度,采用社会学的方法,把研究纳入全球史的视野之中,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的经济变化及其走向。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也采用“大历史”视野,量化历史正好大有可为。

第二,跨学科研究。量化历史研究将规范研究范围扩展到政治学、军事学、气候学等领域。在目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协同创新”的主流话语趋势下,“史无定法”原则不仅适用于历史学,而且适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譬如,历史上很多农耕文明遭到“野蛮部落”入侵以至于衰亡,而中国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战争持续两千多年,那么游牧民族为什么会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不断“抢掠”中原?游牧经济是一种比农耕经济更加依赖气候的原始经济形式,那么可以从经济学基础结合气候去理解战争的起源。外生的降雨量可以作为工具变量,来验证游牧区域的经济状况对其入侵中原政权的影响,但是由于游牧民族地区文字记载不够而不可得到。于是考虑到东亚地区季风气候特征下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气候高度相关,可以选择每十年中原地区的旱灾和黄河决堤次数作为游牧经济低降雨量和高降水量的概率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发现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频率与降水量过少正相关,与降水量过多负相关^②。这为经济结构与暴力冲突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提供了新证据。量化历史研究采取了新数据关注新问题,例如新石器革命与气候变迁、宗教与经济增长的韦伯命题、哥伦布大交换、失踪的女性等女性地位问题、科技变革与人力资本、战争瘟疫饥荒等。显然,这些研究事实上将非经济的因素也纳入了经济史的规范研

究范围。

(二) 数据化的历史资料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整理和历史描述,量化历史研究也必然注重史料的基础。一方面,过去经济史和历史学研究资料为量化历史研究提供了基础的史料。但是这些数据大多需要加工才能使用的。如利用《中国历代战争年表》衡量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汉族的战争就需要逐一甄别哪些战争是游牧民族主动进攻中原政权的。另一方面,很多量化历史研究利用的数据都需要一手挖掘,将历史资料转化为数据。例如,为了估计华娄地区 GDP 就利用了地方志、农书和近代调查资料等资料。以地方志为例,仅 1949 年以前所修的原松江府地区的各种地方志,就有市志 1 种,府志 14 种,州志 2 种,县志 85 种,卫志 5 种,厅志 2 种,乡镇所志 133 种,合计 241 种。这些资料整理工作相当复杂和繁重。量化历史研究成果是有趣的,但是其中的艰辛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放在史料的数据挖掘工作中。

另外,量化历史研究需要构建大规模的数据库。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是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基础。借助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进行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成为趋势^③,历史数据库是数字技术与史学相互激荡的产物^④。由于中国历史变乱更替,史料散失,历史统计数据是很难获得的,数据的真实性也是存疑的,但数据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分,不能放弃。随着新史料的涌现和新技术的采用,大量历史数据被收集整理。考古实物资料、战国秦汉简牍、中古石刻史料、纸制文书、元明清契约文书及档案、改革开放口述史料大量发现及刊布^⑤,并被电子化。目前国内对史料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模式大约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的数据库,数据的搜集整理均有特定的目的指向,

①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76 页。

②Bai Y, Kung J K S. Climate shocks and sino - Nomadic conflict.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vol. 93, no. 3, 2011, pp. 970 - 981.

③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④申斌、杨培娜《数字技术与史学观念》,《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⑤李詹《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户发展的历史轨迹》,《求索》2018 年第 7 期。

如李中清教授团队把历史的和当代的档案资料、社会调查、家谱、碑铭及口述历史联系起来,创立了中西学术界屈指可数的从18世纪一直延伸到21世纪的大规模中国东北个体、家庭和宗族水平数据库。陈志武教授团队系统收集和整理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1736-1895年间26个省的题本档案,包括168481件土地债务类题本、73216件婚姻奸情类题本^①。这些数据库的建立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种规模更大的数据库,侧重于原本古籍等文献的数字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中国近代报刊库、大成老旧数据库等。基于《清代缙绅录集成》的中国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约有280万条记录^②。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已收录从唐朝到清末共41万余名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生卒、别名、地理信息,任官、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等),构建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工具及平台,并提出联合各研究型图书馆构建“全球智慧数据平台”的愿景^③。

(三) 量化技术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和计量分析方法都是量化分析的主要工具,可以根据历史数据的特征选择性地使用。不过,如果历史数据足够,那么就可以采用更加严格的量化模型,以便更严格地讨论复杂理论问题。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断点回归是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

第一,工具变量研究方法。制度和文化的常被认为不能够被计量,是量化研究的短板。事实上,量化历史研究已经采取构建量化指标和

工具变量等方式开始了对制度和文化的量化研究。譬如,为了验证“政治制度”和“市场制度”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差异, Van Zanden 教授设计了“外国城市潜力指数”作为工具变量来表达城市间的贸易程度,收集了公元800年至1800年中东与欧洲地区729个人口大于10000人的城市数据,最终发现市场制度、政治背景和交通共同导致了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并在公元900年开始就导致西欧逐渐取代穆斯林世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④。事实上,巧妙的工具变量设定是量化研究历史制度问题的关键。它使得对制度和文化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量化历史研究范围。

第二,自然实验方法。自然实验一般是指利用制度或政策的突然发生的变化,来检验其对于经济结果的影响。历史事件对于经济结果的影响构成了自然实验,可以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启示。李楠等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管治方式演变为例,考察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影响^⑤。不过,美国经济史学会执行理事费希拜克教授指出,自然实验方法虽然可以提高变量估计的质量,但外生冲击和自然实验可能存在关注问题过小的弊端,所以应该研究更普遍的问题,更多地考虑非自然实验^⑥。

量化历史研究方法有利于规避“选精法”和“集粹法”代表的基于归纳法的传统经济史学的不足^⑦,不过需要牢牢地以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为基础。无论是对数据的处理,还是对史料的挖掘,传统经济史学方法都是量化历史研

①陈志武等《清代妻妾价格研究》,《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1期。

②任玉雪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③[美]包弼德《数字人文与中国研究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11期。

④Van Zanden J L, Bosker M, Buringh E. “From Baghdad to London: Unraveling Urban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800-1800”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vol. 95, no. 4, 2013, pp. 385-398.

⑤李楠、林友宏《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⑥熊金武、刘丛、郝煜《强化国际交流,拓展学术视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⑦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究的基石。好的量化历史研究必然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传统历史研究通过细节描述乃至学者的感悟和体验,再现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过程与变化,量化的设计与过程也需要历史感悟^①。量化历史研究必须与史料和史学相结合。所以量化历史不是对传统经济史学的否定和替代,而是补充和发展。量化历史范式创新需要以传统经济史为基础。

(四) 检验假说和突破“常识”

量化历史将经济史研究主题和视野变得更加宽广,而且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制定的贡献越来越大。不过,这受制于既有的主流经济理论、计算能力和统计技术。可幸的是,这些约束都不断被弱化。早期量化历史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而现在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越来越多^②。量化历史研究可以用于对多种历史家说、经济理论的检验,甚至突破“常识”形成新的认识。为了检验韦伯新教伦理命题,利用中国历史数据发现,新教对经济增长有正的显著影响,而天主教不显著,不过新教伦理影响经济增长不显著,因为以最接近“新教伦理”的加尔文教派为主的县与卫斯理公会教派、浸礼会教派为主的县相比,没有显著经济增长绩效差别^③。对于历史上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也可以采用量化历史研究予以证实或证伪。早期学者研究认为科举制废除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是否果真如此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科举制废除使得社会流动性大大减弱,极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数据表明革命进行比较激烈的地方通常都是原初科举人才频出的地方,从而有力地佐证了上述观点^④。大饥荒死亡人数最多的并不是缺粮

地区,而恰恰是产粮大省,原因与当时粮食分配机制有关^⑤。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不仅仅是由于王朝后期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等,也与长期被忽略的气候变迁存在因果关系^⑥。总体上,量化历史研究能够用数据带来新认知。因为量化历史的跨学科属性能够在交叉领域取得进步,并且在国际比较中突破旧知识。另外,量化历史研究具有可积累性。如果认为既有研究存在遗漏,可以通过收集更多的、更具说服力的数据,设计更为科学的模型来挑战和修正,推动该研究的深入。

三 量化历史的反思与展望

经济史学研究需要不断创新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科学发展趋势。学界曾提出经济史研究创新需要立“四新”和破“四旧”^⑦。按照该标准,量化历史研究正是一种创新。第一,量化历史研究将经济史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了政治、宗教文化、气候环境等因素,有利于大历史的国际比较和区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异时段比较。第二,量化历史研究不仅注重对现有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再利用,还尝试基于一手资料构建大规模、长周期历史数据库。第三,量化历史研究方法有一个规范的框架,并以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作为基础。第四,量化历史研究不仅可以对既有的历史学或经济学理论假说予以检验,而且可以提出基于历史数据的新结论。量化历史研究成果可以接受基于社会科学范式的批评而不断进步。这要求量化历史研究必须有高质量数据并与恰当的理论 and 量化方法结

①龙登高《感悟、想象与活生生的历史》,《金融博览》2015年第8期。

②Greif A. “Cliometrics After 40 Ye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 1997, pp. 400 - 403.

③Bai, Y., Kung, K. S.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 - 1920”.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3, no. 4, 2015, pp. 669 - 698.

④Bai, Y., Ruixue Jia.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 System”. *Econometrica*, vol. 84, no. 2, 2016, pp. 677 - 733.

⑤陈硕《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

⑥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地球科学进展》2014年第1期。

⑦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合,不断完善研究框架和熟练研究方法。因为量化历史研究需要接受严谨的历史学和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的双重检验。

但是,一个新学术范式需要不断地试炼才能成熟。在 20 世纪下半叶旧计量史学就曾一度衰落,原因除了历史数据缺失和研究技术不足之外,还由于夸大了历史数据代表性和计量方法作用。这就要求充分认识到量化历史研究的局限性,做好学术反思。第一,防止量化滥用。从数据上看,一方面,不是所有历史都需要量化,也不是所有历史信息都可以量化;另一方面,历史数据一般都是有偏差的,史料很难保证系统性和完整性。学术研究应该实事求是,根据数据多少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二,强化理论研究。数据和计量要求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发现历史发展中的各种联系和相关性。例如不宜把“GDP”作为比较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唯一标准,需要注意二者在市场化程度、经济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①。同时,量化历史在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对经济学理论的检验上具有优势。例如对于不平等问题,20 世纪下半叶各国间全球不平等不断上升^②,但是如果仅考虑全球范围内人与人的不平等,那么全球不平等水平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度

代表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兴起^③。这种量化历史研究不仅对经济理论而且对经济政策都会有实际影响。但是,如果脱离了理论,为了量化而量化,那么量化历史很难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第三,量化历史研究应以历史为基础。量化历史方法是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量化历史研究不排斥其他经济史学研究范式创新,例如历史社会学、实验经济学^④也被引入经济史研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史学者在国际量化历史学术界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字记载的丰富性是世界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包括支撑量化历史研究需要的大量历史数据和历史事件都是非常丰富的;另一方面,中国量化历史学者规模效应明显,单是每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有 100 名左右,累积已达 600 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国外学术界望尘莫及的。整体上,量化历史研究是一项有益的范式创新,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史学融入国际经济史学界,也有利于中国学者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做出新的贡献。

(感谢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的资助。)

(责任编辑:刘险峰)

①仲伟民、邱永志《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史学月刊》2014 年第 2 期。

② [法] 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2 页。

③ Milanovic B,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④ Lowes, Nunn, Robinson, Weigel,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Kuba Kingdom”, *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 vol. 85, 2017, pp. 1065 – 1091.